

人均 GDP 指标的误用*

阎 梁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 per capita) 是宏观经济学中的重要指标,代表了某一国或某一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人均产出水平。近几年来,许多中国新闻记者以及学者、政策决策者将人均 GDP 指标用于分析政治、外交、军事、社会、科技等非经济领域的现象和问题。跨领域使用该指标,不禁使人产生一个疑问:人均 GDP 真的能反映非经济领域的问题吗?如果人均 GDP 没有这种用途,那么国人为何喜欢用人均 GDP 做标准呢?

一、人均 GDP 在非经济领域的使用

通过对近几年有关文献的检索和阅读,笔者发现,在目前国内的国际问题研究和时事评论中,有不少专著、报告、文章和新闻报道用人均 GDP 解释非经济现象。

* 本文在构思和写作过程中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作者在此特别感谢阎学通教授、周方银博士、徐进博士、漆海霞博士以及匿名评阅人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当然,文中的任何不当和错误由作者本人承担。

(一) 以人均 GDP 衡量现代化水平

现代化原本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是专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社会进程。近年来不少国人把现代化学理解为经济水平的提高过程。在近来的现代化研究中,有研究机构采用各国的人均 GDP、农业劳动力比重以及农业增加值比重三个指标来衡量各国现代化水平的差距。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发表的报告认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任务非常艰巨。如果把人均 GDP 和经济结构的综合年代差理解为中国经济现代化水平与其他国家的年代差距,那么,2001年中国经济现代化水平的国际差距十分显著。中国与美国等 7 个国家的综合年代差在 100 年左右,与德国等 7 个国家在 80 年左右,与日本等 6 个国家在 50 年左右,与葡萄牙等 5 个国家在 30 年左右。所以,中国要达到世界经济的先进水平和中等水平,都不是轻易能够实现的,需要长期艰巨的努力。”无可否认,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水平确实有相当差距,但这个差距果真得上百年这么大吗?

如果以上述三个指标为据,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水平比发达国家还高的结论。以卡塔尔和以色列为例。2002 年卡塔尔的人均 GDP 为 2.36 万美元,本国人不得从事农业,只有少数外来农业劳工,农产品依靠进口;而同年以色列的人均 GDP 为 1.71 万美元,低于卡塔尔,农业劳动人数占总人口 1.1%,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 3%,这两项指标都不如卡塔尔。按这些标准,卡塔尔的现代化水平高于以色列。而事实上,以色列可以生产先进的高科技军事装备,卡塔尔却除了石油工业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工业能力。由此可见,依靠人均 GDP 等三个指标基本上衡量不了中外现代化水平的差距。

“现代化”这一概念出现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其核心含义是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别是多方面的,在政治体制、经济生产、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上都有性质的不同。就经济现代化来讲,其变化的内涵是明确的,即工业化。工业化是指一个社会的生产形态由传统粗放农业生产向集约工业生产的转变。这一生产方式的转变并不是指一国农业生产在国家经济中的比重缩小,而是指生产方式从粗放式转变为集约式。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 2005》,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59 页。

《2002/2003 世界知识年鉴》,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11、255 页。

(二) 以人均 GDP 达到 1 000 美元标志拉美现象 的出现

在拉美研究中,有学者认为,国家或地区达到人均 GDP 1 000 美元后,会出现“中间阶层开始壮大,民众主义改革兴起,各种政治力量的斗争开始加剧,军人开始还政于民等政治变化”。同样,在官方发言中也有类似表述。例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员曾经对“拉美现象”做出如下解释,即在人均 GDP 达到 1 000 美元之后,“如果政府面对各种矛盾处理不当,就会走向贫富悬殊、失业激增、社会矛盾激化,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

以上有关人均 GDP 的表述与历史事实有较大出入。回顾 20 世纪 70—90 年代的历史,拉丁美洲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出现过贫富分化、债务危机和社会政治动荡等现象,其影响一直持续到新世纪,突出表现为前几年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阿根廷危机。表-1 显示了 7 个拉美主要国家在若干时间点的数据。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到 90 年代之间,一些拉美国家出现了如上所述的拉美现象,但此时,它们的人均 GDP 的分布范围很广,从 1 000 多美元到 7 000 多美元之间都有分布,不少国家的人均 GDP 与 1 000 美元相去甚远。历史数据表明,拉美现象是否出现很难用人均 GDP 达到 1 000 美元作为标志。

表-1 7 个拉美国家和中国年度人均 GDP 比较

(按 2000 年美元价值)

	阿根廷	巴西	智利	哥伦比亚	墨西哥	秘鲁	委内瑞拉	中国
1970 年	6 617	1 832	2 220	1 192	3 576	2 070	6 279	122
1980 年	7 551	3 256	2 520	1 616	5 114	2 251	5 820	186
1990 年	5 593	3 090	3 093	1 869	4 966	1 655	4 823	392
2000 年	7 703	3 461	4 917	1 989	5 935	2 046	4 819	949

另一方面,拉美现象中的很多问题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广泛存在,而这些国

拉美现象、拉美化和拉美病是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和媒体对相同研究和讨论对象的不同称呼,在此我们把它看成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

江时学主编:《2004/2005 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人均 GDP 达到 1 000 美元:机遇与挑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62—268 页。

李光荣:《中国经济如何避免重蹈拉美化之“辙”》,《中国经济时报》2004 年 5 月 13 日。

数据引自 *World Development Index*, 见 <http://devdata.worldbank.org/dataonline>。

家的人均 GDP水平差距同样很大,甚至一些国家至今没有实行市场经济。东亚、南亚和非洲的很多国家的贫富差距悬殊、债务沉重、贫困问题也远没有得到解决。在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宗教势力和恐怖主义的影响下,中东、中亚的一些国家社会政治动乱同样多发。即使是在一些发达国家,国内或跨国的社会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展开,一些甚至演变为骚乱、有组织的社会动乱或暴力活动。以上这些国家经济水平千差万别,人均 GDP水平相去甚远,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也是复杂多样的。如果把人均 GDP达到一定数值与这些现象是否出现联系起来,这种做法显然是有问题的。

(三) 以人均 GDP达到 1000 或 4000 美元来说明国防建设的经济基础

有报道指出:“中共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20年前,邓小平做出了一个直抵今天的预言:‘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我看,到本世纪末我们肯定会超过翻两番的目标,到那个时候我们经济力量强了,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2003年,中国 GDP达到 116 694 亿元,人均 GDP首次超过 1000 美元,外汇储备达到 4 033 亿美元。20年前的预言,已是今日的现实。”

同样,也有不少研究人员探讨了经济发展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学者姜鲁鸣认为:“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统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新思路。”他提醒说,千万不要掉进西方国家设置的军备竞赛陷阱之中,而应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发达国家近年来的社会政治动荡主要有:2001年4月,美国俄亥俄州西南部城市辛辛那提发生暴乱事件,暴乱起因于一名年仅19岁的黑人青年托马斯被一名白人警官杀死,暴乱反映了美国种族歧视和贫富过度分化的现实。2004年2月,澳大利亚悉尼郊外发生了由对当地土著人的种族歧视导致的骚乱,有30多名警察受伤。2005年10月,法国巴黎东北部克利希尔郊区的年轻人的死亡,引发了自巴黎1968年“五月风暴”以来最大的一起骚乱。西班牙《先锋报》指出:“没有人应感到庆幸,法国的秋季风暴很可能是欧洲冬季风暴的前奏。这次骚乱不但是对法国的一个警告,也是对世界的一个警告。它表明,要想消除骚乱的根源,必须消除种族歧视,缩小城乡差距,减少失业,弥合社会矛盾。参见 <http://news.sina.com.cn/z/tsb1sl/>。”

《中央政治局探求富国强兵战略》,《瞭望东方周刊》2004年8月9日。

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因此,他主张:“21世纪上半期正是打造中国国防建设全新物质技术基础的关键期,须打好经济、技术和体制三个基础。在经济基础方面,由于中国现在国民经济盘子还较小,经济对战争的支撑力度也相对较小。而未来信息化战争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资源供给并非‘局部’,它需要极为雄厚的国民经济基础。中国现在正处在大发展的机遇期。2003年中国人均GDP已超过了1000美元。从人均1000美元到4000美元,美国花了整整100年,日本用了70年,韩国用了25年。根据中国规划,中国将用比韩国更短的时间去完成这一历史性跨越。”

在前一个报道中,作者引用了邓小平20年前的讲话来说明军队装备现代化只有在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从一般逻辑上讲,这一点是没问题的。但是,作者以2003年人均GDP超过了1000美元而推断我国推进国防建设的经济基础已经具备,这个论断除了用领导人20年前的讲话作为论据外并没有提出事实依据。在后一项研究中,作者认为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并不能说明我国具备应对“未来信息化战争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经济基础。按照作者的理解,这一基础应该等到2020年战略机遇期结束、人均GDP再翻两番达到4000美元时才具备。这一论断同样缺乏经验事实的支持。从现实经验看,无论是人均GDP高达3万多美元的美国和日本,还是人均GDP仅有700多美元的印度,近几年来都在积极推进国防建设。

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如何协调发展是中国长期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不过,现有研究没有从实证角度论证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到底是有先有后,还是应该同时进行。因此,用人均GDP的一定数值来说明推进国防建设是否具备经济基础,可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四) 以人均 GDP 作为评价综合国力的构成指标

综合国力评估和比较是近年来广受关注的问题。综合国力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多个领域,有硬实力和软实力之分。正确认识和评价综合国力必须考虑综合国力构成要素的特点。在综合国力诸要素之间,软、硬实力要

姜鲁鸣:《勿掉进西方国家军备竞赛陷阱》,《文汇报》(香港)2004年11月20日。

素之间是相乘的关系,而非相加的关系。在著名的克莱因方程中,综合国力是硬实力与软实力的乘积。其中,硬实力包括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和军事能力三项,软实力则由战略意图和贯彻国家战略的意志两项构成。

综合国力诸要素之间还有难以转换的特点。经济实力强大,并不意味着政治和军事实力强大。经济实力强可以增加军事开支,但增加军事开支却并不一定能带来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事实力的提高。同样,政治实力更多地表现为一个国家的内外号召能力和动员能力,也不是仅仅靠经济实力强大就能带来的。对此,阎学通进行了论证:“政治实力、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不是随时可以转换的,任何一种实力转换成另一种实力都需要严格的条件和较长的时间。实力要素转换的困难决定了国力结构平衡的国家具有较大的实力优势,也就是说,在维护不同类型国家利益时都有相应的手段。”综合国力的这两个特点决定了,要提升综合国力,需要各个国力要素的综合、平衡发展,不可偏颇。

受克莱因方程的影响,中外学者近年来设计了不同的衡量综合国力的指标体系。在一本最近出版的研究报告中,课题研究人员以国力资源(包含科技力、人力资本、资本力、信息力和自然资源五个小类指标)、军事力、经济力、外交力和政府调控力等五大类指标来衡量各国综合国力的大小,并对10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及其各类指标进行了测量。在对经济力的评价中,该报告使用了GDP总量、人均GDP和GDP增长率三个指标。该课题研究人员经过计算得出结论认为,如果以美国的经济力得分为100,德、英、法、中、加、韩、印、俄等国的经济力得分都在[50,60]的区间上分布。这样的结果显然与各国经济实力的经验事实不符。例如,依据近几年世界银行公布的各国GDP总量数据,当前日本的经济实力约相当于美国的40%,中、英、法三国的经济实力接近,俄、印、韩三国的经济实力接近。又如,在中、日经济力的比较上,人均GDP低不能说明中国的经济实力地位就低,人均GDP高也不能说明日本的经济实力地位就高。尽管中日的经济实力仍有一定差距,但两者已无等级差别。

以人均GDP作为综合国力的构成指标可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这个问题

阎学通:《中国崛起的实力地位》,《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2期,第19页。

李慎明等主编:《2006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47页。

同上书,第266页。

的根源在于,人均 GDP指标所反映的内容与综合国力试图衡量的对象之间不匹配。美国前乔治敦大学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教授克莱因在他所做的“综合国力”评估的研究中认为:“对国力的研究,归根到底,是对进行战争能力的研究或思考,必须予以重视。”他明确地说出了自己在衡量国力时背后的考虑,即进行战争的能力。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认为,一国在综合实力上的相对地位,无疑会影响该国与他国的讨价还价能力,因此我们需要综合实力这个概念。由此可以看出,衡量综合国力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衡量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能力,并用这种能力来评判它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能够发挥的作用。

既然综合国力衡量是为了帮助人们认识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能够发挥多大的影响和作用,就这一目的而言,总量指标更为重要。总量指标可以衡量国家在应对和处理国际事务时能够调动多少资源,而这些资源可以转换成国家的权力和影响力。由于综合国力衡量的重点在于各国可以调动的、能对其在国际上活动的结果施加影响的资源,从而在综合国力指标中可以不考虑个人的幸福指数、福利、生活水平等层面。人均 GDP作为一个反映人们生活水平的指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不过综合国力衡量的是总体实力,在综合国力衡量中使用人均 GDP指标可能并不是恰当的做法。在国内现有的几项主要的综合国力研究中,都纳入了人均 GDP等指标,特别是人均 GDP常常被给予了与 GDP相似的权重,这种做法可能会产生误导性的结果。

(五) 用人均 GDP低反驳“中国威胁论”

有媒体报道:“自 2005 年 4 月以来,‘中国威胁论’又被美国人炒得火热。……事实上,中国不可能对美国构成什么威胁。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很快,

Ray S. Cline, *World Power Trends and U. 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1980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1), p. 13.

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90 页。

周方银:《综合国力视野下的经济实力衡量》,《太平洋学报》2005 年第 5 期,第 28—34 页。

参考黄硕风:《综合国力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王诵芬主编:《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比较研究》,长沙,湖南出版社 1996 年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综合国力课题组:《综合国力评估系统研究报告》(2000 年)。

但与美国相比,差距极大。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03年中国的人均 GDP 只有 1100 美元,而美国的人均 GDP 高达 37610 美元。即使用流行的购买力平价法来估算,中国的人均 GDP 也只有 4990 美元。而早在 1913 年,美国的人均收入就达到 5301 美元。在中国,农村的人口占总人口的 47%,美国只有 1.7%。按西方的标准衡量,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家。一个农业国家怎么可能威胁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呢?今天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有充分的自由,他们可以随意迁移,自由选择工作,自由出国(如果外国驻华大使馆不刁难的话)。中国人目前最缺的不是自由,而是钱。为了钱,中国人在拼命地工作。除非有大规模的外敌入侵,他们仍将集中精力,实现四个现代化,让人民过上和平富裕的生活。在今天的中国,有谁去关心什么威胁不威胁?除非你整天在他的耳边高喊什么威胁。”

另一篇报道指出:“与 2005 年一样,美国和日本提出的‘警惕中国论’依然是 2006 年度东北亚地区国际政治的话题。2006 年 1 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的人均 GDP 达到了 1700 美元,从经济总量来看,中国已经超过法国,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五,这将使西方国家的‘警惕中国论’进一步抬头。不久前,美国在国防报告中指责中国以经济增长为基础推行军事和政治大国路线,日本也加入到美国指责中国的行列。中国提出了和平发展理论,积极反击美日鼓吹的‘警惕中国论’。中国对此言论的反击包括三个方面。一、与帝国主义国家依靠侵略战争掠夺他国的资源和劳动力不同,中国发展经济并未采取剥削和压榨方式,反而向西方发达国家开放市场,吸引投资,依靠中国丰富的劳动力推进经济发展。二、近几十年来,中国对所谓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战争不可避免的论断进行了修正,认为只有保持周边局势和平,中国才能通过吸引外资实现经济发展,因此积极推进和平发展政策。三、尽管中国目前发展很快,但经济规模与美日相比还相差甚远,人均 GDP 也不过 1700 美元,中国还不富裕,因此无论从哪方面看,美日的‘警惕中国论’都没根据。”

在前一篇报道中,作者以中国比美国人均 GDP 低、农业人口比重高,以及

《“中国威胁论”与台湾问题》, <http://www.chinataiwan.org/web/webportal/W2001030/Ulybo/A104540.html>, 2005 年 8 月 31 日。

李永日:《“警惕中国论”是事出有因还是杞人忧天?》,《明日新闻》(韩国)2006 年 2 月 16 日。

中国人只关注实现四化而不关心威胁来反驳“中国威胁论”。在笔者看来,“中国威胁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别有用心政治炒作,不过,中国是否威胁他国应当由其他国家的人们根据一定的标准来感受和评判,但作者却用中国人自己不关心威胁问题去批驳“中国威胁论”,自然是无关痛痒。另外,中国是农业国并因此不会威胁作为工业国的美国的论点同样与事实不符。在 1990 年的海湾战争中,伊拉克入侵了邻国科威特。1989 年,科威特的人均 GDP(以 2000 年美元为标准)为 14 364 美元。笔者没有能查到当时伊拉克的人均 GDP,但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伊拉克 2005 年的 GDP 为 293.44 亿美元,人口为 2 790 万人,据此推算的人均 GDP 为 1 052 美元。尽管经历两次海湾战争,伊拉克经济遭到较大破坏,其 1990 年到 2005 年的人均 GDP 水平可能有较大的下降。不过,通过比较以上两组数据,我们还是可以推断,伊拉克的人均 GDP 水平与科威特相比存在较大差距。而且,同样作为世界主要的产油国,除了石油工业,农业在伊拉克经济中仍占有重要地位,而国土面积很小的科威特对石油工业的依赖程度更高。事实是,农业比重更高的伊拉克最终对科威特发动了军事进攻。这表明,人均 GDP 低和农业比重高的国家照样可以威胁人均 GDP 高和农业比重低的国家。

在后一篇报道中,作者认为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认为“警惕中国的原因有三:一是经济实力的增长,二是军事实力的增长,三是认为在国家战略层面,中国正在走政治大国路线。由此可见,西方国家认为,中国的威胁不仅来自实力因素,还来自国家的战略意图。对此,该报道说,中国提出了和平发展论予以反驳。论据之一是中国通过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实现了经济增长;第二,中国对和平和战争形势的判断发生了改变。应该承认,这两点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第三点用中国人均 GDP 水平低来反驳“中国威胁论”可能很难获得西方人的理解和认同。毕竟,美、日等国家可能更关心中国经济总量和军备总量的增长以及中国未来的战略意图,它们很可能不像中国人那样关注中国的人均 GDP。

(六) 以人均 GDP 低解释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于国际水平

在中国科学院的工作会议上,有论者用人均 GDP 解释中国科技落后时指

数据来源:World Development Index,参见 <http://devdata.worldbank.org/dataonline/>。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参见 <http://web.worldbank.org/data&statistics>。

出：“经济水平低，科技投入和产出不足。在《2001年世界竞争年鉴》中，Monitor公司的报告描述了人均GDP与科技指数的关系。瑞士的人均GDP是4万多美元，美国是3万多美元，中国是1000美元。……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经济水平低下使得科技水平不高，反过来科技投入不够，也制约着科技水平的提高。另外，我们的科技产出是不是和经济发展有紧密联系，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

该报告作者既然认为以人均GDP为标志的经济水平低导致科技投入和产出不足，那么，提高科技产出和科技水平的办法应该是大力发展经济和增加科技投入。但是，作者又说：“中国处在工业化过程尚未完成阶段，同时在进行新技术革命，但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解决办法一是靠技术引进，二是靠自主创新，但我们必须强调自主创新。”可见，作者很快又否认了他自己前面的看法，认为提高科技产出不能仅靠人均GDP和科技投入，还是要么主要依靠技术引进，要么靠自主创新。事实上，自主创新和科技产出不仅是硬投入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软的科研体制。人均GDP并不一定能转化为科技实力。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人均GDP很高，但其科技水平并不高，如比利时和阿联酋等。相反，印度的人均GDP很低，其经济实力低于中国，但印度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水平并不低于中国。

以上列举了近年来常见的误用人均GDP的实例，并指出了其与经验事实的不符之处。此外，国内还有不少误用人均GDP的其他例子。比如，有媒体使用经济逻辑考虑道义问题。2005年8月29日，在美国南部地区遭受“卡特里娜”飓风袭击后，中国政府宣布向美国提供500万美元救灾援款，并另提供一批救灾急需物资。一位记者在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出这样的问题：“目前中国的人均GDP只有1000多美元，为什么中国政府还要向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提供援助呢？”商务部部长助理陈健表示，中国在遭到困难的时候，别国也帮助过我们，这种帮助历来就是相互的。他强调：“中国对外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不取决于国家之间人均GDP的差异，只是基于中国对外

《我院高技术产业化工作的思考——江绵恒副院长在中国科学院2004年产业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4年11月29日。见中国科学院网站，<http://www.cas.ac.cn/html/Dir/2005/03/01/5142.htm>。

同上。

提供紧急救灾援助的基本立场。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一直秉承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精神。中国愿意为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创造和谐世界尽义务、作贡献”。

人均 GDP 在中国被误用的实例还有很多,涉及各个领域的方方面面,在此不再一一枚举。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許多中国人热衷使用人均 GDP 呢?

二、人均 GDP 误导中国人的原因

笔者认为,人均 GDP 指标在我国被大量误用的原因可以概括为:首先,植根于人们头脑深处的“经济决定论”思想导致人们习惯用经济因素解释社会、政治、军事、科技等几乎一切领域内的问题和现象;其次,“人口负担论”又使中国人偏好用庞大的人口规模去均摊 GDP 总量指标,并用人均 GDP 低(意即国家贫穷)来解释中国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最后,领导人的部分讲话得到不同的理解和阐释,使人均 GDP 与许多领域内的具体问题建立起了“联结”。在社会学习原理和认知原理的作用下,这些“联结”得到不断强化和扩展,形成了“人均 GDP 认知图式”并在全社会范围内流行。该认知图式强化了人们不分场合、不分条件地使用人均 GDP 来解释问题的社会心理倾向。本文的解释逻辑可用图-1来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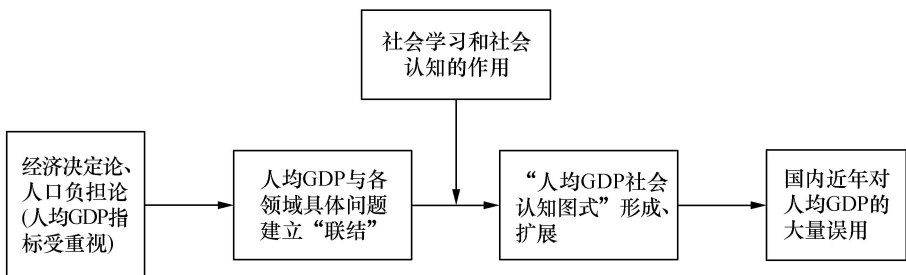


图-1 人均 GDP 指标误导中国人的途径

《中国为何向最大的发达国家提供援助》,《中国青年报》2006年1月19日。

(一) “经济决定论”和“人口负担论”共同导致对人均 GDP指标的重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发展生产力极为重视,并把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长期工作的中心。这一国策的确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政治上拨乱反正,同时在经济上更有改变我国生产力长期落后局面的现实考虑。

不过,伴随这一工作重心的转移过程中,“经济决定论”的思想也时有出现,哲学上最早提出并系统阐发这一思想的是17世纪的英国政治理论家詹姆斯·哈林顿。哈林顿认为:“财产是理解一个共同体的公共事务的钥匙。只有在财产广为分散的地方,民主政体或者共和国才能运转。”他把英国革命的发生解释为此前经济革命的结果:“那场经济革命结束了国王和少数贵族对财富的垄断,把财富分配给了中等阶层。由于经济结构改变了,政治上层建筑也随之变革。”尽管哈林顿的解释并不完全符合当时英国革命的状况,但他对后来的思想家和经济工作者产生了明显影响。

受“经济决定论”的影响,部分中国学者比较重视经济因素的作用,在对很多问题和现象进行分析时,倾向于寻找其经济根源。这种倾向在对国家外交行为的分析中也有明显的体现,例如,日本首相小泉于2006年8月访问蒙古,其主要原因是为了应对国内批评其强硬对外政策破坏了与东北亚国家的关系。然而,出于思维定式影响,中国媒体的报道却说小泉访问蒙古是为了与中国争夺蒙古的资源。事实却是,蒙古2004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1亿美元,比东芝TCL公司在中国海南岛的一个分公司的12亿美元年产值还少。而且,蒙古油气资源不通过中、俄是无法运到日本的,中国自己对油气的巨大需求以及俄巨大的油气出口,决定了不存在中、俄帮助蒙古修建到日本的油气运输线的

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刘北成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84页。

郭隽:《日本首相小泉10日将访问蒙古盯上矿产资源》, <http://news.sohu.com/20060804/n244629959.shtml>; 刘晓文:《小泉“能源外交”收山之作处处牵制中国》, http://intl.ce.cn/specials/zxxx/200608/01/t20060801_7970333.shtml; 严圣禾:《小泉再度访蒙耐人寻味,加紧争夺资源开发主导权》, <http://world.zjol.com.cn/05world/system/2006/08/04/007786913.shtml>; 匡鹏:《小泉启程访问蒙古可能谈及能源与争常》, <http://news.tom.com/2006-08-10/000N/17724446.html>

《2005/2006世界知识年鉴》,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页; 吴少贤:《东芝TCL家电制造(南海)有限公司昨投产》, <http://www.fsonline.com.cn/news/foshan/hot/200607020008.htm>。

可能。

“经济决定论”是被广为接受的思维方式,但人们在研究具体问题的时候却往往把它简单地理解为经济贫富论,从而导致“人口负担论”的出现。由于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负担重常常成为人们分析各种问题和现象时的一个方便的视角。“经济决定论”和“人口负担论”的结合,其结果是对人均 GDP 指标的重视。这种重视在很多时候是合理的,但在另外一些场合,人均 GDP 数值与所讨论的对象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只是由于社会心理因素的作用,人们仍试图用人均 GDP 来解释或标志相关问题,由此导致对人均 GDP 指标的一些误用。

在人口问题上,国外学者在论述时最初把人口的增减视为国家实力的消长。如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就认为,在国家权力的要素中,“人口包括人口数量和质量两部分……人口数量是国家权力所依赖的因素之一,竞争权力的各个国家的人口的相对数字,特别是它们的相对增长率值得认真注意。……在其他因素大致相同的条件下,与其竞争者相比,一国人力的急剧减少标志着国家权力的下降;在相似的条件,人口的大量增加意味着国家权力的增长”。也有学者认为,人口太多会成为国家的负担。在克莱因方程中,人口和国土面积构成国家的“基本实体”。克莱因认为,人口是决定一个国家国力的第一位因素。一般说,人口太少(比如在 1 500 万人以下)的国家是不大可能排在世界大国、强国的行列的;但是人口过多(如超过 2 亿),超过国内经济的负担能力,弊病也会非常明显地暴露出来。克莱因规定,人口的标准满分为 50 分,并且提出 2 亿人口作为满分的临界标准。一般来说,人口较多的国家给予高分,较少的国家逐渐降低给分。如果人口太多以至成为一种负担的国家则要适当减分(如中国、印度均减去 25 分)。而人口不满 1 500 万的国家 and 地区不给分。受其影响,国内有的学者在研究综合国力时参考了克莱因的做法,在对人口指数赋值时,“人口较多的国家的指数较大,人口较少的国家指数较小,但人口太多以至成为一种负担的国家则要适当减少指数”。

汉斯·J. 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52—203 页。

黄硕风:《大较量:国力、球力论》,长沙,湖南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8 页。

同上书,第 86 页。

近年来,国外学者开始从国家总人力资本的角度来看待人口问题。例如,泰利斯等学者就认为:“人力资本特别是获得教育的机会和能力被视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发展中国家丰富的人力资本更容易吸收和使用从发达国家引进的新技术。……一国总人力资本可以定义劳动年龄人口与其平均受教育年数的乘积。”泰利斯等学者对人口因素的理解已经从过去重点关心人口总量,转变为关心国家是否拥有一定数量的受过一定年限的教育和拥有一定专业技能的劳动年龄人口上来。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并不把大量人口当成负担,而是视为潜在的人力资本。只要一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与其受教育年限同步增长,该国家的人力资本总量就在增加,从而更有利于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扩散。以这个观点看,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渐趋稳定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中、印等人口大国拥有的庞大人口规模不应被视为是国家的负担,而是国家人力资本方面的潜在优势。

中国国家领导人对人口问题有着全面、客观的认识。例如,邓小平就曾经指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现在全国人口有九亿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人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都成为严重的问题。我们要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但是即使若干年后人口不再增加,人口多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也仍然存在……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比方说,现代化的生产只需要较少的人就够了,而我们人口这样多,怎样两方面兼顾?不统筹兼顾,我们就会长期对着一个就业不充分的社会问题。”部分国内学者也认识到了人口问题的两面性。例如,黄硕风就曾指出:“劳动力问题有其两面性,其一,如果众多的劳动力能合理利用并产生生产效益,则为优势;其二,如果使用不当,众多的劳动力就会形成强大的就业压力,称为劣势。如何充分合理地利用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正是发展我国综合国力过程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尽管部分领导人和学者都意识到了人口问题的两面性,但是,一定时期以

阿什利·泰利斯等:《国家实力评估:资源、绩效、军事能力》,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2年版,第 6 页。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163—164 页。

黄硕风:《综合国力新论》,第 149 页。

来,由于存在对领导人讲话的不同理解以及国情教育的反复强化,很多人还是把人口视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负担,从而出现了“人口负担论”。例如,对上述邓小平的讲话,很多人不是重点思考如何发展生产和“统筹兼顾”以解决就业问题,而是把“人口多、底子薄、耕地少”作为有些部门做不好工作的天然理由。同时,国情教育中反复强调中国的人均 GDP、资源人均拥有量和工农业产品人均产量等指标在世界排名 100 名以后,结果造成人口是包袱的观念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例如,尽管看到了人口问题的两面性,黄硕风还是强调说:“人口增长,给经济发展和资源及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和不少产品产量,从总量上计算,已位居世界前几位甚至第一位,但按人均算,却处在世界的后列。比如,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1993 年达 5446 亿美元,居世界第七位,但人均却处在世界第 100 位以后;煤产量 1995 年为 12.4 亿吨,居世界第一位,但人均却处在第 75 位;原油产量 1995 年 1.5 亿吨,居世界第一位,但人均却处在世界第 140 位以后。……可见,只有总量的增加,而没有人均占有量的增加,很难谈得上综合国力的增强。”

“人口负担论”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后果:很多人把人均 GDP 低仅视同于中国贫穷的现实,人均 GDP 低成为解释各种问题处理不好的原因。“人口负担论”造成的另一个后果是,在评价国家实力时,中国学者倾向使用各种人均指标,并对国外学者习惯使用总量指标感到困惑。例如,有媒体说:“据世界银行对 2004 年人均 GDP 的排名,第一位是卢森堡,为 43940 美元;总量有可能被中国超过的法国和英国,人均 GDP 也分别为 24770 美元和 28350 美元。在这一排序中,中国在一百位左右。这在发展中国家也不算是佼佼者。国际舆论在观察中国经济指标时,总是有意无意地忽略人均这一重要指标,而热衷于放大总量指标”。

实际上,正是由于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劳动力资源丰富而工资成本较低的优势,才使得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纺织服装、玩具、电子电器等轻工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增强,较好地解决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城市新增人口的就业问题。

黄硕风:《综合国力新论》,第 179 页。

见 http://mil.33369.com/33369_4/123555995.htm。

(二) 社会学习和社会认知：“人均 GDP 社会认知图式”的产生和扩展

本文试图运用社会心理学的学习理论和认知理论来描述“人均 GDP 社会认知图式”的形成、扩展及其如何导致中国人误用人均 GDP 的过程。

学习理论早在 1900 年就开始流行,并在当时成为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基础。学习理论假定行为主要是由个人的学习经验而来,把行为的原因归于外在环境而忽视人对环境的主观感受。该理论认为,在任何情境下个体都会学到某种行为,在多次学习之后还会形成习惯。以后,当相同或类似情境再次出现时,个体将会采取惯用的方式做出反应。人类的学习主要有三种机制:联结、强化和模仿。联结是人们比较熟悉的条件反射作用。例如,看到“纳粹”字样就会想起对犹太人的暴行。强化是学习理论的核心,指人们学会一种特别的行为,是因为这种行为经常伴随着愉快、能满足某种需要,或者可以避免某种不愉快的后果。例如,学生在政治考试中答出课本上的标准答案会得到老师的高分。模仿是人们通过观察他人的态度及行为而学习到的社会态度和行为。例如,青少年对政治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与父母保持一致。

要理解社会认知理论,须首先定义知觉和社会认知。“知觉是指人在受到刺激后进行选择、组织和判断自己接收的信息的过程。人对刺激因素的反应是基于他对刺激因素的知觉,而不是基于客观真实的刺激因素本身。”认知原理超越了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模式,把知觉因素视为人类心理过程的独立环节,这一点是社会心理学的一大进步。知觉包括人知觉和物知觉,前者是指人对他人的知觉,也称社会知觉,后者是指人对物的知觉。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泰勒对社会认知的定义是,人们根据环境中的社会信息形成对他人或事物的推论。而在社会认知过程中,分类与图式是最重要的。分类是指人们在认知他人他物时,并不是将其当成独立的个体,而总是立即并自发地将之归到某一类当中,并将分类的物体与该类物体的一个典型或理想的范例(原型)相比较。图式是由泰勒和克罗克提出来的,它是指一套有组织、有

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3 页。

侯玉波:《社会心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7 页。

结构的认知现象,它包括对所认知物体的知识,有关该物体各种认知之间的关系及一些特殊的事例。

为节省时间与精力,人们常用图式化的办法去处理大量的信息。图式可以帮助我们解释新信息,从而获得有效的推论;提供某些事实,填补原来知识的空隙;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的预期加以结构化,以便将来有心理准备。但是图式化处理也有不足,它使人们觉得不需要去详细分析与解释特定的性质。

有学者指出了图式发生作用的过程及其顽固性,认为“图式一旦被情景线索引发,它就具有强有力的、想用理论概念驱动的或自上而下的信息加工处理过程(即相信由以前的知识和先入之见提供的信息)取代数据或自下而上的信息加工过程(即相信来自于直接经历的即时背景中的信息)的趋势。……人们可以通过间接的方式获得图式,例如从他人那里,从文献中,从大众传媒中获得图式,也可以从偶然事件中获得图式,这些偶然获得的图式往往能够加强其内容的抽象性、精确性和丰富性,图式一旦形成,就会变得非常顽固,不易改变。这种对改变的抵抗直接来自于图式可以提供对顺序、结构和社会环境一致性的感觉的认知”。由此可见,人们更倾向于利用头脑中已有的认知图式来处理新信息,而不是去做具体的经验考察和分析,这就使得人们容易把一些复杂问题简单处理并得出可能错误的结论。同时,图式形成后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在认知一致性原理的作用下,在遇到与自己原有认知图式不相符的新信息时,人们往往不愿意改变自己已有的认知图式。

以下,笔者试图根据上述的社会学习原理和认知原理来描述和解释“人均 GDP 社会认知图式”是怎样产生和流行的。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国家领导人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国策,其后国家又推出了以“人口多、底子薄、耕地少”等内容为核心的国情教育。由于客观存在对人均 GDP 的特别关注,在一系列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人均 GDP 与许多领域内的具体问题之间建立起了“联结”。此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让学生学习这些基本国策和国情。

侯玉波:《社会心理学》,第 49 页。

Kurt Pawlik, Mark R. Rosenzweig, *T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Psychology*, first edi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0), p. 437.

成年人也会通过领袖著作、会议报告、报纸、继续教育学习到这些政策和国情。这些学习内容以是否通过考试或考核的形式得到“强化”，并在人们生活中的各种社会关系之间彼此“模仿”。通过社会学习原理的三大机制，人均 GDP 与很多领域的具体问题建立了联系，“人均 GDP 社会认知图式”开始形成并不断得以扩展，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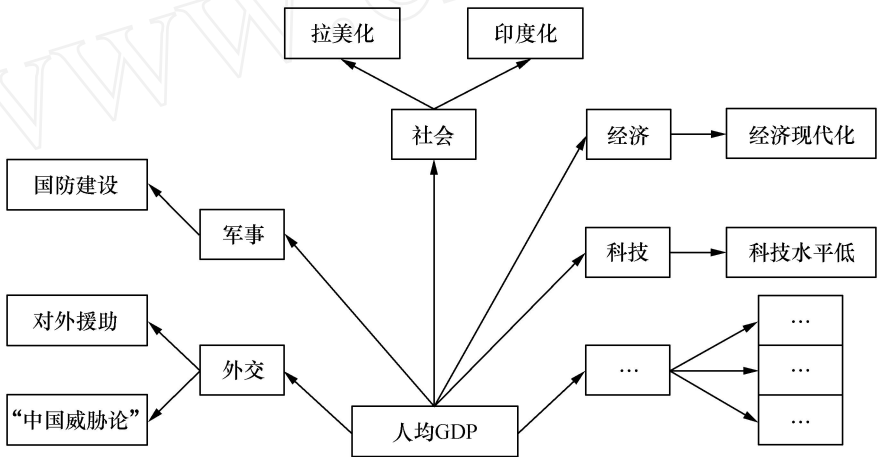


图-2 “人均 GDP 社会认知图式”

值得强调的是，在该图式中，人均 GDP 与“中国威胁论”、对外援助、国防建设、拉美化、现代化、科技水平等外交、军事、社会、经济、科技等领域内的众多问题“联结”起来。这些“联结”也许可以从国家领导人著作中找到某种只言片语的依据，但后来各级领导人讲话也发挥了这种“联结”和扩展图式的作用。此外，图-2所示的“人均 GDP 社会认知图式”始终处于变动和扩展之中。除上述领域外，人均 GDP 还被用来解释教育、人口、交通等更多领域内的现象和问题。图-2描述的认知图式是比较完整的示意图，它在人们头脑中可能是以局部的形式存在，该图式发生作用的形式和程度也可能有所不同，这取决于认知主体的工作部门和角色、认知能力和社会学习的程度等因素。例如，军队人员比较关心人均 GDP 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外交人员则更多用人均 GDP 来说明“中国威胁论”和对外援助；新闻媒体则用人均 GDP 说明图-2中几乎所有领域内的末梢问题；而受过严格学术训练并具有较高认知能力的学者在研究具体问题时，

则可能几乎不受该图式的干扰。

根据社会认知原理,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需要解释的问题或现象时,首先对问题或现象进行分类,将它们划分为“可以用经济因素解释”和“不能用经济因素解释”的两大类(对于有些人而言,可能还存在第三种类别,即“不知道是否能用经济因素”)。现实情况是,由于受“经济决定论”和“人口负担论”的长期影响,在中国,用经济因素来进行解释的现象越来越多。很多人在接收到包含有需要做出解释的新信息时,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就将其归入第一类。分类完成后,人们会调用头脑中的“人均 GDP 社会认知图式”来进一步理解和解释新接收到的信息。新信息在人脑中的信息加工过程可能产生三种结果:第一,新信息与原有认知图式相符,该图式得到进一步强化;第二,由于新信息与原有图式不符而被忽略;第三,新信息与原有图式不符,修改或扩展原图式以适应新信息。第三种结果解释了“人均 GDP 社会认知图式”为何不停地变动和扩展,被用来解释更多领域内的更多问题。然而,消除“人均 GDP 社会认知图式”的影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原因是人们有维持认知一致的心理需求。

三、对本文观点的验证

以下,我们使用曾在本文第一部分引用的那些文献,从文献梳理的角度来验证本文的观点。

(一) 受“经济决定论”影响,部分中国人习惯于用经济因素解释和理解一切

阅读前文引用的文献,我们不难发现文献作者在字里行间体现出的“经济决定论”思想,举例验证如下。

在中国科学院的现代化研究报告中,作者指出:“众所周知,经济进步是现代化的基础和主要动力。没有经济的现代化,就没有全面的现代化。显然,经济现代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值得也需要深入研究。”从这里可以看出,由于受到“经济决定论”的影响,作者认为经济进步是现代化的基础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 2005》,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前言部分。

和主要动力。实际上,四个现代化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谁决定谁的问题。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后来几乎完全被经济现代化的目标所取代,由此可见“经济决定论”对我国现代化目标制定的深刻影响。

同样,在综合国力研究中,黄硕风指出:“经济是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根基。经济力在综合国力构成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包括各部门的经济实力、经济体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国民生产总值、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等。”作者强调了经济力在综合国力中的决定性作用,体现出非常明显的“经济决定论”思想。

(二) 在“人口负担论”影响下,部分中国人倾向于用人均 GDP 低来解释问题

在有些研究中,我们可以明显观察到这样的现象,作者出于对庞大人口规模的关心而选用人均 GDP 指标的考虑。在另外一些研究中,作者选用人均 GDP 指标,或者是受“人口负担论”潜在影响,或者只是沿袭了以往的研究习惯。

黄硕风在其研究中指出:“人口数量对综合国力的差异影响很大,大约有 40 多个指标都与人口数量有关。一般讲,人口数量与本国资源相互匹配则其综合国力增长,排序则靠前,否则,人口过多,超过本国资源所允许限度,人均水平低,则综合国力相对衰减。例如,中国、印度人口过多,人均水平低,影响了综合国力的排序。”为了进行国际间各国经济力的比较,他重点从经济总量、人均水平(人均 GDP 等)、增长速度、经济结构等四个方面进行对比,认为“人均指标更能确切地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水平。如果在非常时期(比如战争时期)一国经济总量水平的作用就很大,因为国家可以采取紧急措施,集中国家所有的财力物力用于抗敌和自强。但在和平时期,人均水平的意义就更大些”。在这项研究中,作者认为中国、印度的大量人口对综合国力具有负面影响,因此人均指标更能反映各国经济实力,这显然是受了“人口负担论”的影

黄硕风:《综合国力新论》,第 12 页。

同上书,第 149 页。

同上书,第 127 页。

响。尽管作者承认人均指标的局限性,认为其在战争时期作用不大,但在实际操作中,他始终把人均 GDP 作为衡量综合国力的指标之一。

在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 2005》中,作者介绍了经济现代化的数量模型的含义:“经济现代化定量变化是经济增长、结构变化和国际经济地位变化的交集;经济现代化的相对水平等于人均 GDP 和经济结构的相对水平的几何平均值,经济结构相对水平等于农业和物质产业劳动力比重、农业和物质产业增加值比重的相对水平的简单算术平均值;经济现代化相对水平的变化,反映了国际经济地位的变化。”在报告中,作者使用了人均 GDP 和经济结构的相对水平的几何平均值来计算经济现代化的相对水平。尽管该报告在指标设置时没有明确指出是基于人口规模因素的考虑而使用人均指标,但在该报告的其他部分,作者指出:“在世界经济现代化的现行国家之中,没有一个国家具有中国的人口规模。事实上,目前的发达国家的总人口约为 9 亿,比中国人口少了 4 亿。所以,中国现代化面临更多的挑战。”在这里,作者将中国的庞大人口视为现代化面临的挑战,其实质仍是把人口当成现代化的负担。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进行的综合国力研究中,作者在报告中尽管没有表现出“人口负担论”的思想,但也把人均 GDP 作为评价不同国家的经济力水平的指标之一,这显然是沿袭了前人的研究习惯。实际上,在该研究中,作者已不再把中国总人口和总劳动力当作负担来看待,并因此得出了中国人力资源排在世界第一位的结论。作者认为:“中国人力资源排在第一位,主要在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2004 年中国劳动力总量达 7.87 亿人,是排在第二位印度的近两倍。……总之,中国国力资源的发展优势在于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充裕的资本资源、长期稳定的国内环境、稳中求进的政府政策等等。”与之类似,也有学者明确使用总量指标来评价各国的综合国力,得出了与以往明显不同的结论。胡鞍钢和门洪华在《中美日俄印综合国力的国际比较:兼论中国大战略》一文中,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 GDP 总量,得到的结论是,中国的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 2005》,第 278—282 页。

同上书,第 157 页。

李慎明等主编:《2006 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第 247 页。

经济资源在 1998 年已经超过日本 (7.82%), 占世界比重的 10.23%, 接近美国的一半 (21.29%); 这两位作者不再把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视为负担, 并以劳动年龄总人口与其受教育年数乘积表示的人力资本来估算, 从而计算出 1998 年中国人力资本占世界比重为 24%, 居第一位, 是印度的 2 倍, 美国的 3 倍。由于这两项重大调整, 作者得出了与以往综合国力研究中不同的看法, 认为“中国是一个综合国力迅速上升崛起的世界第二大国。1980 年中国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的 4.736%, 低于前苏联和日本; 到 1998 年, 中国综合国力提高到 7.782%, 居世界第二位, 比 1980 年提高了 3.046 个百分点, 属于迅速上升型”。

(三) “人均 GDP 社会认知图式”的形成和扩展过程分析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起, 由于存在对领袖著作和领导人讲话的不同理解, 人均 GDP 与许多领域的问题都建立起了“联结”。随着这些“联结”不断地被扩展, “人均 GDP 社会认知图式”得以产生。此外, 2003 年, 中国人均 GDP 超过 1 000 美元, 加上有关国际危机的刺激, 促使该图式不断扩展。在各种文章、研究报告和报道中, 人均 GDP 的使用领域扩大、解释的问题增多, 其社会影响亦相应上升。

1979 年 10 月 4 日, 邓小平在中央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就经济工作发表讲话, 提到了中国现代化目标和人均 GDP 的关系, 以及人均 GDP 与对外援助的关系。他说: “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 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 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所谓政治, 就是四个现代化。我们开了大口, 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口, 叫中国式的现代化, 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 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据澳大利亚的一个统计材料说, 1977 年, 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为 8 700 多美元, 占世界第五位。第一位是科威特, 11 000 多美元。第二位是瑞士, 10 000 美元。第三位是瑞典, 9 400 多美元。第四位是挪威, 8 800 多美元。我们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达到人均上

阿什利·泰利斯等:《国家实力评估:资源、绩效、军事能力》(门洪华、黄福武译), 中文版序言, 第 19 页。

千美元？前一时期我讲了一个意见，等到人均达到 1 000 美元的时候，我们的日子可能就比较好了，就能花多一点力量来援助第三世界的穷国。现在我们力量不行。现在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大概不到 300 美元，要提高两三倍不容易。我们还是要艰苦奋斗。”

1979 年 12 月 6 日，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邓小平又提到现代化目标、对外援助和人均 1 000 美元的关系。此外，他还表达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不会威胁他国的看法。他说：“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 1 000 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有可能对第三世界的贫穷国家提供更多一点的帮助。那个时候，中国国内市场比较大了，相应的，与国外的经济交往，包括发展贸易，前景就更加宽广了。有人担心，如果中国那时候稍微富一点了，会不会在国际的竞争中起很大的作用？既然中国只是一个小康的国家，就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坦率地说，现在我们的对外贸易总额还不如台湾多。我们发展到台湾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不会对国际市场产生什么威胁，因为自己的需要多了。”

在上述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邓小平阐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同时还把 20 世纪末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与人均 GDP 达到 1 000 美元联系起来。这里，可以说，领导人对人均 GDP 1 000 美元的举例式的说明，只是典型的偶然“联结”，但这一“联结”后来被固定化，并成为“人均 GDP 社会认知图式”的组成部分，使得人均 GDP 1 000 美元作为中国现代化的阶段目标而广为传播。同样，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人均 GDP 的增长不会使中国在未来国际市场竞争中起很大的作用，这一“联结”后来同样被人们固定化和加以扩展，原本用来反驳贸易和经济威胁的人均 GDP 现在被用来反驳笼统的“中国威胁论”。

在 80 年代初中国做出裁军决定时，邓小平曾说：“我们国家现在支付的军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94—195 页。
同上书，第 237—238 页。

费相当大,这不利于国家建设;军队人员过多,也妨碍军队装备的现代化。减少军队人员,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这是我们的方针。如果能够节省出一点用到经济建设上就更好了。冷静地判断国际形势,多争取一点时间不打仗还是可能的。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军费开支来加强国家建设。总之,搞四个现代化也好,把军队搞精干、提高战斗力也好,都需要‘消肿’。”他的本意是在说明裁军的必要性,一是对较长时期内和平国际环境的判断,二是中国正在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所以要求军队在实现经济“翻两番”目标之前支持国家的经济建设。通过裁军可以节省部分军费,以用于经济建设。但是,这些表述以及周边和平环境后来被用来说明国防建设应该长期让位于经济建设。

近几年,我国“人均 GDP 社会认知图式”不断发生变动和扩展的现实背景是,2003 年我国人均 GDP 首次突破了 1000 美元,达到 1090 美元。媒体对此进行了大量宣传报道,国内出现了用人均 GDP 理解各种现象和问题的高潮。例如,有报道说:“经过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的发展,我国综合国力跻身世界前列。与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不同,我国的现代化和工业化是建立在两个基本的国情之上:第一,底子薄、基础差,科技力量不足;第二,人口多、耕地少,资源相对稀缺。而且,新中国成立 56 年来,我国人口大幅增加了,达到了现在的 13 亿多。然而,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人均 GDP 从建国初期的不足 100 美元、改革开放初期的不足 200 美元,增长到现在超过 1000 美元。”这篇报道不但强调了 we 克服了人口负担重和资源短缺的基本国情,而且还引证了前面提到的改革开放之初国家领导人把现代化目标同人均 GDP 1000 美元“联结”起来的表述。

另外,近几年误用人均 GDP 现象大量增加的趋势还有来自国际危机的刺激。2003 年,中国人均 GDP 达到 1000 美元的时间正值墨西哥危机和阿根廷经济危机结束不久。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有领导人和不少学者将人均 GDP 1000 美元与拉美现象“联结”了起来,扩展了“人均 GDP 社会认知图式”,并据此来讨论人均 GDP 达到 1000 美元后,中国如何借鉴拉美国家的经验教训,避免或减少两极分化和社会政治动荡。受“拉美化”问题的影响,国内学者在观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85 页。

《从数字看“十五”特别报道:人均 GDP 超 1000 美元》,《经济日报》2005 年 10 月 8 日。

察到印度等南亚国家的贫困、两极分化和社会动乱等现状后,又提出了“印度化”命题,进一步扩展了“人均 GDP 社会认知图式”。

四、结 论

“人均 GDP 社会认知图式”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危害是多方面的。以追求人均 GDP 和 GDP 总量增加作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使中国掉入唯 GDP 增长的单一发展目标中,并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最终国家目标。人均 GDP 不能代表各国现代化过程中在生产规模、技术和管理水平等方面的相对差距。用人均 GDP 1 000 美元作为拉美现象的出现标志,就可能轻视基尼系数等重要的社会监测指标。市场经济国家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是否出现拉美化现象的适当标志,不是人均 GDP 的特定数值,而是失业率、贫困率、收入分化状况,以及信用和道德问题突出与否。以人均 GDP 的一定数值为限、强调在此之前国防建设应该为经济建设让路的思想,可能会延误中国进行国防建设的重要时机,导致中国的安全环境趋于严峻。人均 GDP 达到 1 000 美元或 4 000 美元,并不表明国防建设具备了经济基础。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之间不是谁先谁后的关系,而是相互促进和相互保障的关系。把人均 GDP 列入衡量综合国力的指标体系,低估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其实,较为可取的做法是,可以综合考虑名义汇率和购买力平价计算的 GDP 总量指标来衡量经济力。即使如此,GDP 也难以衡量国家的军事力、政治力以及使用国力资源的意志和决心,因为各个实力要素之间存在难以转换的特点。凭借人均 GDP 低来反驳国外反复出现的“中国威胁论”,在外交领域也收效甚微。国外是否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除了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增长外,还有中国国家战略意图的本质及其公开透明的程度。以人均 GDP 低来解释中国科技水平低,会使人误解只要增加科技投入就能提高科技水平,从而可能造成资金投入的浪费。人均 GDP 的高低解释不了科技水平的先进与落后,与资金投入相比,决定科技水平更重要的因素是科研体制和研究人员的科学精神。

人均 GDP 误导中国人的原因起源于“经济决定论”和“人口负担论”的结合。这两者的共同作用,导致许多中国人对人均经济指标特别是人均 GDP 的特殊偏好。由于领导人的部分讲话得到不同的理解和片面阐释,人均 GDP 与

许多领域的问题之间牢固地建立起了“联结”。在社会学习原理和认知原理的作用下,这些“联结”不断扩展,致使“人均 GDP 社会认知图式”得以不断产生和广泛流行。该认知图式强化了人们不分场合、不分条件地使用人均 GDP 来解释问题的社会心理倾向。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进展和严谨科学研究规范的推广普及,人们对各部门、各行业工作性质和规律的认识也在逐步加深。近几年来,“人均 GDP 社会认知图式”开始得到逐步纠正。例如,在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上,逐步纠正了改革开放之初形成的国防建设要为经济建设长期让路的认识,形成了两者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认识。2004年7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了第15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明确强调,“在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切实加强国防建设”,要使二者相互促进;并认为应“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由此,胡锦涛总书记清楚地阐述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关系: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本依托,经济建设搞不上去,国防建设就无从谈起;而国防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防建设搞不上去,经济建设的安全环境就难以保障。

此外,在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关系上,在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问题上,中国的政策取向也将更加关注增长的均衡、机会的均等和社会的公平,避免和缩小更大的贫富差距,从而不再仅仅关注经济总量的增长和人均 GDP 的提高,以往的“先富”政策正被“共富”政策所替代。可以预见,随着国家和社会各界对“人均 GDP 社会认知图式”认识的进一步加深,人们对人均 GDP 指标的误用将会趋于减少,其负面作用的范围和程度也会得到有效控制。

《中央政治局探求富国强兵战略》,《瞭望东方周刊》2004年8月9日。

作者简介

向钢华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候选人。1985年获浙江大学工学学士学位,1990年获北京理工大学工学硕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军事威慑、军事决策与博弈分析。

电子邮箱: xianggh_03@em.tsinghua.edu.cn

王永县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1966年在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获工业企业电气化学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决策理论与管理决策优化。著有:《国外的国家经济安全研究与战略》(2000年)、《运筹学》(1993年)。

电子邮箱: wangyx@em.tsinghua.edu.cn

王莉欢 1986年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获社会科学学士学位;200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获国际关系学硕士学位。现在新加坡政府任职。

电子邮件: laifoonwong@pacific.net.sg

阎梁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2005级博士研究生。1995和2001年分别在西北大学和兰州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2002—2005年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所任助理研究员。著有:《社会危机事件处理的理论与实践》(2003年)。

电子信箱: yanliang05@mails.tsinghua.edu.cn

潘成鑫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院讲师。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获法学学士和硕士学位,2004年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96—1997年为墨尔本大学政治学系访问学者。研究兴趣为中国外交、中美关系、东亚安全。论文曾发表在 *Alternatives, Political Science* 等学术刊物上。专著 *Understand 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estern Representations of an Emerging Superpower*, 将由英国 Edward Elgar Publishers 出版。

电子信箱: chengxin.pan@deakin.edu.au

李巍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06级博士研究生。2003年在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2006年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研究兴趣为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美国政治与对外政策。

电子信箱: kindyleeway@gmail.com

王勇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1987、1990和1996年先后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获法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研究兴趣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贸易政治、中美经贸关系。著有:《最惠国待遇的回合:1989年至1997年美国对华贸易政策》(1998年)、《知识经济对策:运作与案例》(1998年)。

电子信箱: yowang@pku.edu.cn